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植春
郭沫若

韩愈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64.2
1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韩愈

【散文选集】

吴小如 韩嘉祥 选注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614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散文选集 / (唐)韩愈著; 吴小如, 韩嘉祥编.
2 版.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1763-X

I. 韩... II. ①韩... ②吴... ③韩...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唐代 IV. I26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9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97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9.8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韩愈和他的散文

吴小如

—

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 768 年），死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 年），原籍河南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当时人们非常重视“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是韩姓的郡望，所以韩愈也自称“昌黎韩愈”。宋神宗元丰年间追封他为“昌黎伯”，后人常称他“韩昌黎”。又因其官至吏部侍郎，又称为“韩吏部”。韩愈死后，谥曰“文”，后人又称之为“韩文公”。

韩愈的七世祖耆，在后魏时曾任常山太守，封武安成侯。六世祖茂，曾拜尚书令、征南大将军。五世祖均，曾任定州刺史。高祖峻，入唐后为银青光禄大夫、雅州刺

史、雅州都督。曾祖仁泰，官曹州司马。祖父睿素，曾任桂州长史。

韩愈的父亲仲卿，是大诗人李白的好友，曾为潞州铜鞮（今山西沁县）县尉，旋又调任武昌县令。李白曾作《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盛赞其才干和治绩。

韩愈的三位叔父少卿、云卿、绅卿，也都是很知名的。李白赞少卿说：“少卿，当涂县丞，感慨重诺，死节于义。”（见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云卿以文章名世，韩愈《科斗书后记》中说：“愈叔父（指云卿），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归韩氏。”李白也誉称：“云卿，文章冠世，拜监察御史，朝廷呼为‘子房’。”（见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绅卿，为扬州录事参军，有政声，李白赞说：“绅卿，尉高邮，才名振耀，幼负美誉。”（见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

韩愈兄弟四人（其中有一哥哥早夭），他最小，三岁时就失去了父母，由其长兄韩会及长嫂郑氏抚养成人。韩会也有文名，是古文家李华、萧颖士、梁肃的好友。韩愈在《韩滂墓志铭》中提到韩会说：“起居（韩会官起居舍人）有德行、言词，为世轨式。”他还在另一篇文章《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中说：“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章优一世。”可以说韩愈是深受其长兄影响的。在韩愈十岁时，因韩会远贬，随之到了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市），韩会到韶州两年后，病死，长嫂郑氏排除万难，带领孤儿，扶柩北归河阳。韩愈十九岁时到长安应考，六年里在礼部考了四次，至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二十五岁的韩愈才中了进士，同榜有欧阳詹、崔群、李观、李绹、冯宿

等一批名士,当时被称为“龙虎榜”。随后,连续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结果都失败了。他求仕心切,于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三次上书宰相,也都没有得到回音。二十八岁时,韩愈怀着“不遇时之叹”郁郁离开长安,东归故里河阳。在长安十年中,他受到古文家独孤及、梁肃等人影响,并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友,切磋诗文,饱览典籍,已逐渐形成了文学上卓然成家的见解。

贞元十二年(796年),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韩愈应聘至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入幕,任节度使观察推官。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死后,韩愈也离开汴州,不久,到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节度使推官。张建封去世后,韩愈也离开徐州。贞元十八年春,三十五岁的韩愈,召入京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两年后,改任监察御史,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又受到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排挤,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德宗去世,顺宗李诵即位,赦诏天下,韩愈得到宽赦,离开阳山到郴州候令。是年秋,被派往江陵做法曹参军。顺宗只做了八个月的皇帝就因病退居太上皇,八月,新皇帝宪宗李纯即位,元和元年(806年)夏,韩愈被召入京,任国子监博士,翌年,请调派东都洛阳国子监教书。其后几年,韩愈得到几次升迁,元和四年,任东都官员外郎;元和五年,任河南县令;元和六年,回京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元和七年,再度任国子监博士;元和八年春,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九年冬,为考中郎中,知制诰;元和十年,任中书舍人;元和十一年,任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裴度出征淮西吴元济,五十岁的韩愈

任行军司马。淮西平叛后，韩愈迁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正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几于处死，幸赖裴度、崔群求情，才免一死，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是年十月遇赦，调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元和十五年秋，召回京为国子监祭酒；穆宗李恒长庆元年（821年）秋，迁兵部侍郎；长庆二年，镇州（今河北正定）王庭凑杀主帅田弘正，侵犯邻境，韩愈奉命宣抚，冒险入乱军之中，陈说利害，情词剴切，使骄兵悍将为之感动，愿听命朝廷。回京后，授吏部侍郎。长庆三年夏，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冬，复为兵部侍郎，又迁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八月，以病辞职，十二月二日，卒于长安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转年正月，葬于河南河阳祖塋。

韩愈有子一人，女五人。子名昶，曾从张籍学诗，从樊宗师学古文，长庆四年中进士。女婿中知名者三人：李汉，官至吏部侍郎，曾编订《昌黎集》并作序。蒋系，官至尚书左仆射。樊宗懿，官至集贤校理。

二

在我几十年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漫长过程中，曾摸索出两点近于规律性的体会。一是对于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的看法。我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无论是艺术实践还是理论建设，只有对文化艺术遗产继承得最多的人才有可能突破前人而有所创新和发展。试举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为例，钱先生学问之渊博精深，当世之人已难望其项背；然而他在学术研究中创新

的见解最多,无论对文学、史学、哲学均有重大贡献,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厥功尤伟。相反,一个人如果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一知半解甚或一无所知,只一味考虑所谓创新与发展,则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侥幸取悦于众人和取胜于一时,最终也必将昙花一现,成为过眼的烟云。二是在文化艺术的历史长河中,凡被认为存在着矛盾的双方,如哲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文学领域中的骈文和散文、古体格律诗和现代的自由诗,都不是壁垒森严的两个尖锐对立体,更不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两个方面。不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突出,居于优势,如此而已。通过这两点认识,来观察分析、探索研讨韩愈的散文,窃以为庶几能够得出比较符合韩愈创作实际的公正结论并给以合理的评价。关于韩愈继承了从先秦至西汉的散文创作,而且有长足发展的事实,历来很少争议。韩愈本人在《进学解》中也做了明确的自白:“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关键在于韩愈对自东汉至六朝这一历史时期文学遗产的态度。我以为,单凭《送孟东野序》里韩愈对魏晋六朝(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章基本上以骈文为主)的批评是不全面的。他说:“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

无章……”然而事实上，韩愈本人的骈文写得相当好（否则他不会对骈文的缺点提出上述那样中肯的意见）。尽管他写的那些贺表之类文章属于酬世之作，但通过这些作品完全可以证明：韩愈在“未能免俗”的必要时刻，仍须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而撰写骈四俚六的“时文”，同时也足以说明韩愈这位古文巨匠同样是一位骈文高手。其实，具有类似我上面所说的那两点体会的观点而用来评价韩愈文章的，前代也并不乏其人，而且都有较深刻的认识。只是晚近治文学史的人习惯于人云亦云的简单化“二分法”，没有认真对待而已。如清人刘开（字孟涂）在他《与阮芸台（元）官保论文书》中就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文集》卷四）又如刘熙载在《艺概》卷一《文概》中也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所谓“包”，即指旁搜远绍，博采众长，把前人文化遗产中凡可以继承的都尽量吸收过来，加以融会贯通而据为己有，形成了自己所独具的新成品、新事物；所谓的“扫”，则指推陈出新或除旧布新，通过去粗取精、遗貌取神的手段而创出自己的一条新路。因此我认为，韩愈所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名篇（也包括唐宋八大家中其他几位及其追随者的若干篇文章），并非同六朝以来发展至唐代的骈文形成壁垒森严、势不两立的截然互异的作品；相反，在这些名篇中我们随处可以发现韩愈（也包括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有着融骈入散、寓骈于散的操纵文字、控驭辞章的戛戛独造的写作

本领。例如，曾被苏东坡誉为有唐一代唯一佳作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就是韩文中熔诗、骚、辞赋、骈文于一炉的亦骈亦散而又非骈非散的上乘之作。它如《与鄂州柳中丞书》两篇，其遣词造句之整饬凝重，其布局结构之谨严有法度，皆足以与东汉若干名篇比肩齐步。由此可见，苏轼所说的“文起八代之衰”，也不免有囿囿笼统的语病；何况韩愈明明说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则东汉文章原在韩愈所肯定的范畴之内。苏轼只看到东汉的文章词采渐趋于华美骈俪，句式也日益整齐划一，便认为风气已衰，去古日远，显然是不够全面，也不够确切的。

三

在前人的评论中，认为韩愈的散文本从先秦的经史百家之言融会发展而来，是屡见不鲜的。如说《原道》出于《孟子》，《论佛骨表》出于《尚书·无逸》，《画记》出于《周礼·考工记》，《答李翊书》出于《庄子》，《鳄鱼文》模仿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送穷文》渊源于扬雄的《逐贫赋》等，皆属于追本溯源之论。李商隐在其名诗《韩碑》中，更指出韩愈的力作《平淮西碑》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说明受《尚书》和雅、颂的影响极其明显。这些意见已大抵为古今读者所接受，历来很少有争议。但我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韩愈散文最卓越、最可贵的成就乃是他能在继承古人的著作与文章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新奇的文章风格，体现出个人独特的精神面貌，表达了迥异凡俗的思想见解和发自内心

的真挚感情。例如《为人求荐书》和《应科目时与人书》，尽管是模仿《战国策》的干谒之作，却写得傲骨峥嵘，不同凡响。《杂说一》以龙为喻，《杂说四》以马为喻，《答陈商书》竟自我做古，创造了一个齐王好竽而有人偏以鼓瑟去取悦他，终于碰了一鼻子灰的故事，虽说都是借鉴和继承了先秦诸子及《战国策》中的寓言手法，而其有所发展创新的特色却是一望而知的。他的《进学解》，无疑出于东方朔《答客难》和扬雄《解嘲》，可是他的写法几乎与古异辙，比起班固的《答宾戏》、蔡邕的《释诲》、崔骃的《达旨》和郗正的《释讥》那些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作品来，真是高明百倍，不可同日而语了。他的名篇《张中丞传后叙》，不少人都认为得司马迁《史记》之神髓，而清人如方苞、刘大櫆、张裕钊等，却纷纷指出这篇夹叙夹议的文章，既有锋芒棱角而又具屈盘道劲的特点，“仍系退之本色”。后人每谓《原毁》的结构很像八股文，然而我们知道，八股文乃明清时代的产物，在韩愈当时而用那种像两扇大门一样完全对称式的间架结构写文章，实在是一种崭新的创造。

尤其值得“表而出之”的是：韩愈的散文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情韵不匮，主要在于他的以诗为文。如果说，韩愈的以文为诗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上不算取得太大成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那么，他的以诗为文却给他的散文创作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并大大加速了散文创作发展与提高的步伐。《送董邵南序》、《送区册序》、《送杨少尹序》、《送浮屠令纵西游序》、《与孟东野书》、《祭十二郎文》，乃至像《杂说一》、《杂说四》、《择言解》一类议论文字，无不洋溢着诗的情

趣,呈现出诗的风采,扣人心弦,感人肺腑,读起来俨如一首首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抒情诗。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以及晚于韩愈而受其深刻影响的欧阳修、苏轼,在以诗为文这一写作特点上,也都表现了突出的非凡的成就。然而做为发轫者和奠基人,韩愈这种迈往独行的开创精神是亘古常新的。尤其在韩愈晚年,写作技巧日臻成熟,他竟能把既无实质内容,又缺乏具体素材的,在他人认为根本无法着笔的空中楼阁,写成一篇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仅通情达理而且饱含着个人情感色彩的文章。如《新修滕王阁记》、《送杨少尹序》、《殷中少监马君墓志》等,都属于这一类。尽管这类文章的思想内容不免贫乏,可是文章的艺术特色和写作技巧还是值得参考借鉴的。当然,只注重它们的艺术技巧而不注入以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如后来桐城派文人所经常犯的那种飘浮虚泛、空疏肤廓、华而不实的毛病,其结果便自然成为无聊的陈词滥调。清末的曾国藩是看到了这个缺陷的,所以他在评论《新修滕王阁记》时,有一段话就切中这类文章所共有的弊病:“此等蹊径,自公(指韩愈)辟之,亦无害;后人踵之以千万,乃遂可厌矣。故知造意之无关义理者,皆不足复陈也。”(《求阙斋读书录》)正指出文章缺乏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所谓“义理”)而只有以虚代实的文字技巧,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读韩文,也应该对此作有批判的继承。

四

在封建社会,人们对韩愈散文的评价是依违于文与

道之间的。以宋儒为代表的理学家们认为韩愈虽视佛老为异端,以继承孔孟之道自命,却未能真正摆脱文人习气,算不上一位地道儒家思想的传人;而主张抒情言志、高唱性灵的文人才子,则又嫌韩愈的卫道气味太浓,认为他的文章还不是“出于沉思,归于翰藻”的真正文学创作。这后一种论调到“五四”以后更大大占了上风,爽性把韩愈及其文章归之“载道派”。明清以来,自“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被高度推崇之后,古文家一提到韩愈的代表作,总是强调《原道》、《与孟尚书书》(这是《原道》的姊妹篇)、《争臣论》、《平淮西碑》这些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对封建王朝正面歌功颂德的作品。平心而论,我们对韩愈这一部分作品也并无完全否定之意,只是感到这一批作品在今天已逐渐失去它们所曾起过的作用,因之这些文章本身也逐渐失去了它们曾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闪烁过的光泽文采。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要肯定的韩文的内在价值,比起封建士大夫的观点和趣味来,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这里我想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兴趣来谈谈我个人对韩文的取舍标准。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绝对不强求他人同意。我认为,在韩愈的全部散文中有三类作品还是比较可取的,值得肯定和继承借鉴。第一类文章是艺术水平较高,而内容又能较多地反映出当时(主要是自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元和之际)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属上乘之作。如《张中丞传后叙》、《圜者王承福传》、《太学生何蕃传》、《送李愿归盘谷序》、《柳子厚墓志铭》等。第二类是讽刺杂文。我始终坚持这样

一种看法,即唐宋八大家及其周围的一批作者有不少杰作是属于杂文性质的。如果我们要撰写一部中国杂文史,则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轼诸家必须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韩愈的杂文名篇,如《原毁》、《杂说》、《获麟解》、《蓝田县丞厅壁记》、《讳辩》、《答陈商书》、《毛颖传》、《送穷文》等,不仅所讽刺的内容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讽刺的艺术手法也是第一流的。第三类是抒情小品。三十年代初,周作人、林语堂诸人大力提倡晚明小品,竟把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列为小品文的对立面。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也是不公平的。我前面曾谈到以诗为文是韩愈散文的一大特点,在我所列举的那些富有诗意的文章中有不少都属于精彩纷呈的抒情小品。此外,如《欧阳生哀辞》及《题哀辞后》、《题李生壁》、《女挈圻铭》等,不仅开苏轼、黄庭坚小品之先河,甚至同晚明小品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只是多少年来很少有人爬梳剔抉,进行系统的研究比较,以致不为人注意罢了。此外,韩愈受当时志怪传奇小说影响而创作的文章并不止《毛颖传》一篇,《石鼎联句诗序》和《柳州罗池庙碑》也都具有小说家言的特色。

当然,韩文中基本上属于糟粕之作的也并不少。如一篇又一篇向有权势在位者干谒的书信,层出不穷的谀墓文章,以及那些“未能免俗”的为达官贵人代笔和向皇帝歌功颂德的贺表之类,都成为韩文中的赘疣。此外,还有一些反映作者思想上的患得患失和暴露其世界观中鄙俗庸劣一面的作品,如《猫相乳》、《释言》诸篇,即使在封建社会,已被某些有见识的文人学者进行指责批评,那么

我们就更不必为贤者讳了。总之，只要是糟粕，就该名正言顺无保留地予以批判。不过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引述而罗织疵病了。

五

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散文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深宏的。散文到了韩愈手下才真正地提高到文学境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他之前，散文大都用于实际和功利，自韩愈起，散文才被公认为是一种文学形式，后来的作家也将散文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散文发展史上，韩愈的出现，结束了一种局面，同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韩愈的古文，气势充沛，纵横捭阖，散骈交错，诡譎多变。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短幅小品，都能闲中肆外，大小毕浮。正如苏洵所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当然“古文运动”不是韩愈说的，是后人总结而加上的），不仅仅是他在理论方面的建设，更重要的是他创作了大批光照千古典范的散文作品。宋代的文学家秦观对韩愈的成就有一概括的评价：“钩庄、列之微、挟苏、张之辩，摭迁、固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如韩愈之所作是也。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淮海集·